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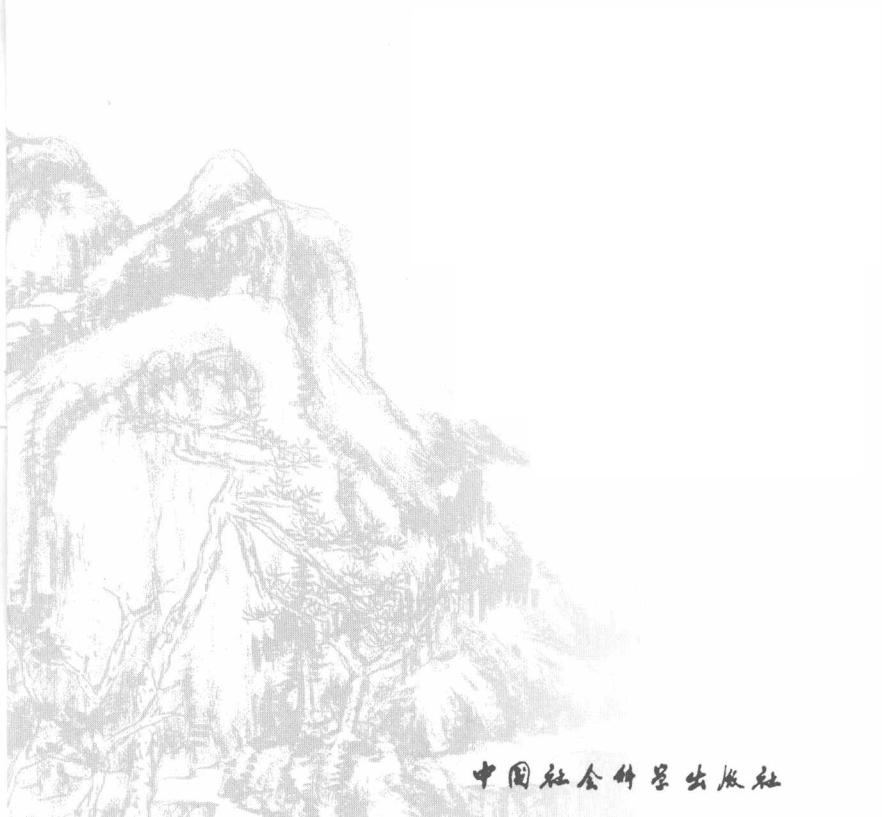
春秋诗话笺注

◎董运庭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春秋诗话笺注

◎董运庭
著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春秋诗话笺注/董运庭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13. 10
ISBN 978-7-5161-2700-1

I. ①春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诗话—中国—清代—选集
②《春秋诗话》—注释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12670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郭晓鸿
特约编辑 许继起
责任校对 张杰利
责任印制 戴 宽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(邮编 100720)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中文域名:中国社科网 010-64070619
发 行 部 010-84083685
门 市 部 010-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印 张 14.5
插 页 2
字 数 248 千字
定 价 4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:010-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前言	(1)
凡例	(17)
春秋诗话笺注卷一 赋诗	(19)
春秋诗话笺注卷二 解诗	(65)
春秋诗话笺注卷三 引诗	(117)
春秋诗话笺注卷四 拾诗	(192)
春秋诗话笺注卷五 评诗	(214)
苏序	苏 珥(221)
张序	张汝霖(222)
盛序	盛逢润(223)
何序	何梦瑶(224)
后序	罗天尺(225)
跋	伍崇曜(226)

前 言

诗话是我国古代诗学理论的主要形式，文体近于随笔札记，内容多是谈诗论诗，文字灵活自如。随意拈出一字一句，点评议论，妙趣横生。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诗论源远流长，诗话著作卷帙亦夥。历代的诗话著作针对诗人及其作品，或推敲一字的得失，或记叙得句的甘苦，或辨析风格的异同，进而上升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理论高度。一般认为，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是最早的诗话著作。郭绍虞说：“诗话之体，顾名思义，应当是一种有关诗的理论的著作。溯其渊源所自，可以远推到钟嵘的《诗品》，甚至推到诗《三百篇》或孔、孟论诗的片言只语。但是严格地讲，又只能以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为最早的著作。欧阳修的著作，由于是创体，所以只题《诗话》，其称《六一诗话》或《欧阳文忠公诗话》者，乃是后人为了诗话日多，恐怕混淆，才加上专名以资区别的。稍后，司马光仿其体，续有所作，即称为《续诗话》，其称《温公续诗话》者，也是后人加上去的。从这样讲，诗话体制的定型，不妨说是从欧阳修开始。”^①近年来，学界对这个界定已有所突破，虽然用语仍较为谨慎。蒋祖怡说：“足以当后世诗话先驱的是梁代钟嵘的《诗品》，它是评论五言诗的专著。”^②海外学者更是把诗话著作的上限往前推。郑子瑜说：“其实，最早的诗话著作应该是南朝宋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的《文学》篇，它和稍后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的《文章》篇，都可以说是诗话的滥觞。”^③学术上的

① 郭绍虞：《清诗话·前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。

② 蒋祖怡：《中国诗话辞典·前言》，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3页。

③ 郑子瑜：《中国修辞学史稿》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，第291页。

这些努力和动向，无疑有其值得肯定的动因，不过平心而言，似皆未为探本之论。

清代是中国诗话理论空前繁荣的时期。清人承宋、明之余绪，发扬光大，诗话著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，都大大超过宋、明两代。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，乾嘉考据学风的流行，汉学、宋学与各种学术日趋繁荣，诗话著作也异彩纷呈，蔚为大观。郭绍虞说：“诗话之作，至清代而登峰造极。清人诗话约有三四百种，不特数量远较宋代繁富，而述评之精当亦超越前人。”^① 随着文献典籍的不断发掘，现在看来，这个估计显然过于保守。蒋寅著有《清诗话考》，他说：“综合现有的材料，仅见存书目和亡佚待访书目，已得书 1469 种，清诗话的总数超过 1500 种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一很保守的数字，让我们对清代诗学的繁荣有了一个最粗浅也是最基本的知识，从而对研究的展开感到胸有成竹，充满信心。”^② 清代的诗歌创作难以与唐、宋比肩，而清代的诗话成就自可雄视千古。王国维说：“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：楚之骚，汉之赋，六朝之骈语，唐之诗，宋之词，元之曲，皆所谓一代之文学，而后世莫能继者也。”^③ 清代的“诗文评”（含诗话、词话、曲话等）和小说，自是一代文学之所胜，而为“后世莫能继者也”。

在清代诗话著作中，劳孝舆的《春秋诗话》无论体例还是内容，都非常特殊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，独一无二。他所取材的《诗经》和《左传》，都不是所谓吟咏情性或“羌无故实”之作，而是在中国古代具有“悬诸日月而不刊”的经典的地位。他论列、考察《左传》中的《诗》，关注的核心是《诗三百》在春秋时期的存在与传播，以及当时的人们用诗论诗的心态与状态。历代诗话著作所言之诗事，虽亦有涉及《诗三百》者，但绝大多数是关注汉魏以还各代之诗作，尤其关注本朝本地诗坛之盛事。《诗三百》是先秦儒家的“六经”之一，到汉代被称为《诗经》，成为朝廷认定的经典，也就成为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。《诗经》研究也就自成一套经学阐释的话语和方法体系，诗文评一类的著作不敢贸然涉足庄严神圣的经学殿堂。自从汉代“以《三

① 郭绍虞：《清诗话续编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。

② 蒋寅：《清诗话考·自序》，中华书局 2005 年版，第 2 页。

③ 王国维：《宋元戏曲史·序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，第 1 页。

百五篇》当谏书”^①，后人遂无意在传统《诗经》学之外，为《诗三百》再撰诗话，另作品评。毛庆耆说：“所以先秦两汉有诗学而无诗话。《春秋诗话》一反常态，以诗话之形式，言经传之诗事。其中‘诗’出于《三百篇》，‘话’出于《左传》故事。从而将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，填补了此前上古无诗话的空白。”^②这个评价是公允的。

其实，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把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，有填补空白之功，并不是今人才发现的。雍正癸丑年（1733），盛逢润在给《春秋诗话》作序时就说过：“少时读《孟子》，至‘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’，尝为转一语曰：‘《春秋》作而《诗》乃不亡’。”他对孟子的名言别有顿悟，并逆向推导出一个道理：《春秋》的问世和流传，才是《诗三百》不致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闻的重要原因。他的这个猜想，在展卷披阅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时得到印证，所以他欣喜地写道：“类聚群分，章疏句解，要皆发前人之所未发。……劳君以壮年英发，乃能于旧巢故垒中别开生面，确然可以信今而传后。”张汝霖是《春秋诗话》的访求刊刻者，于雍正乙卯年（1735）与劳孝舆同科拔贡，时任广东佛山地方长官。他年少于劳孝舆，故以地方长官和“年眷弟”（同科学弟）的双重身份为《春秋诗话》作序。他在序中说：“古诗学何为哉？学以用诗，学以说诗。……自六艺之教衰，而诗学寢微，旂鼎不铭大雅之勋，而里巷莫究先王之泽。士徒抱残守阙，挟一说以自封。自唐以后，以诗话著者，无虑数百家，君子伤其用之不复见也，或者并其说而失之，此南海劳子《春秋诗话》所由作也。”他在序中又说：“如劳子者，谓非深于《诗》不可也，谓非深于《春秋》不可也。……若夫言诗之家，擅汉剿宋，均失之愚者，则又何也。是书出，其庶可以无憾已。”春秋时期，《诗》亡而诗学不亡；岂但不亡而已，恰是中国诗学的第一个高峰期。中国的诗话著作，有义不容辞的责任，追溯到中国诗学昌盛的源头。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绍合《诗经》与《左传》二典，将春秋时期的用诗、说诗逐条论析，排比论次，故能“于旧巢故垒中别开生面”，“发前人之所未发”。劳孝舆脱樊篱，在传统《诗经》学之外为《诗三百》撰写诗话，另作点评，应该说，他是吃这个“螃

① 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：“武、宣之间，经学大昌，家数未分，纯正不杂，故其学极精而有用。以《禹贡》治河，以《洪范》察变，以《春秋》决狱，以《三百五篇》当谏书，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。”

② 毛庆耆：《春秋诗话·前言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2页。

蟹”的第一人。前人、今人肯定他的《春秋诗话》有填补空白之功，断定其必有传世之价值，都是立足于这个层面来说的，也都是正确的论断。研究春秋诗学的草创之功，确非劳孝舆而莫属。

二

我对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产生兴趣，始于三十年前读朱自清的名著《诗言志辨》之时。见朱自清在书中反复征引劳氏之言，殊觉有味，遂想劳氏之书，定当有其不同凡响之处。然而当时，此书借阅不易。遍访重庆、成都及各高校之图书馆，才觅得民国二十五年（1936）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，收入王云五主编的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的《春秋诗话》竖排本。披阅之后，印象颇深。我萌生为《春秋诗话》作笺注的念头，大约就是酝酿于那个时候。

乾隆辛未年（1751），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付梓问世。二百五十多年，此书流布并不广，学术影响也不算大，与其自身的价值显然不成正比。《四库全书》未收录《春秋诗话》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仅将其列入集部诗文评类的存目之中。近人丁福宝汇辑《清诗话》，郭绍虞汇辑《清诗话续编》，这两部规模较大的、专收清代诗话著作的丛书，都没有收录《春秋诗话》。到1971年，杨家骆主编《历代诗史长编》，乃据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影印，由台湾鼎文书局出版。直到1996年，广东省编纂《岭南丛书》，才有毛庆著点校的《春秋诗话》收入该丛书，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。

劳氏之书，是在作者逝世五年之后才付梓刊刻的。作者的几位友人在数篇序、跋中对此书赞誉有加，今天看来，他们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，且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故，并非陈义过高、言过其实。然而此书问世之后，却时运不济，备受冷落。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，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评语，无疑是给了它当头一棒。不是封杀，胜似封杀。其评语曰：

其书专取《春秋左氏传》之言诗者集为五卷：一曰赋诗，如重耳赋《河水》、秦穆赋《六月》之类。二曰解诗，如郤至解《兔置》、穆叔解《三夏》及《文王》、《鹿鸣》之类。三曰引诗，如郑太子忽辞昏引“自求多福”、陈敬仲辞卿引“翘翘车乘”之类。四曰拾诗，乃古诗轶句，《左氏》拾而出之者，分赋、诵、讴、歌、谣、箴、铭、投

壶词、繇词、谚、隐各名。五曰评诗，则为吴公子观乐一篇。每条后各以所见附著之。既不同诠释传文，又非尽沿讨诗义。编葺虽勤，殊无所取也。^①

这段评语，是对《春秋诗话》进行了严格的“政治审查”之后所作的结论。评语首先简述全书五卷的内容，最终用“殊无所取”四字，将此书价值一笔抹杀。理由有两条：其一，“既不同诠释传文”，谓劳氏没有为《左传》作正义笺疏一类的诠释，因此从经学的角度说，无价值可言。其二，“又非尽沿讨诗义”，谓劳氏又非专注于探讨诗义源流，因此从诗学的角度说，也无价值可言。在四库馆臣看来，劳氏之书充其量只可视为一辑资料汇编，故曰“编葺虽勤”，以示厚道。

劳氏《春秋诗话》之所以不被四库馆臣接纳，是因为此书存在着与生俱来的身份认同的尴尬。也就是说，找不到归属感，无家可归。在中国古代，诗学历来为人所津津乐道。而“诗学”之含义，殆有两端，一曰《诗经》之学，二曰诗歌之学。在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这部大型的综合性丛书中，诗学也就有两个集结地：《诗经》之学归于经部诗类；诗歌之学归于集部诗文评类。这两个集结地，也各有其“准入门槛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经部诗类总评：“（无论汉学宋学）传自圣门者，不能废也。……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，王柏之横删圣籍者，论有可采，并录存之，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。至于鸟兽草木之名，训诂声音之学，皆事须考证，非可空谈。”^②意思是，除了“鸟兽草木之名，训诂声音之学”以外，准入门槛就是圣门真传，符合仲尼删述大义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集部诗文评类总评：“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，则断自刘勰、钟嵘。勰究文体之源流，而评其工拙；嵘第作者之甲乙，而溯厥师承，为例各殊。至皎然《诗式》，备陈法律；孟棨《本事诗》，旁采故实；刘邠《中山诗话》、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，又体兼说部。后所论著，不出此五例中矣。……《隋志》附总集之末，《唐书》以下则并于集部之末，别立此门。岂非以其讨论瑕瑜，别裁真伪，博参广考，亦有裨于文章欤！”^③劳氏之书，既不属

①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下册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806页。

②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上册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19页。

③ 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下册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779页。

于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等“五例”之列，又非“讨论瑕瑜，别裁真伪”之体，所以在问世以后二百余年之间，踽踽独行，孤立无援，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两处茫茫皆不见”。

困境是显而易见的。“《四库》的评价摆在那里，在过去谁也不敢去碰它。道光丙午伍崇曜编《岭南丛书》，重刻《春秋诗话》，就遇到《四库》评价的难题；既然‘殊无所取’，还重印它干什么？难道是因为‘编葺虽勤’而再版？”^①伍崇曜推重劳氏，为将《春秋诗话》收入《岭南遗书》而煞费苦心，婉转周全。他在《跋》中说：“经部中无此书也。纯用本色说经，铿铿匡鼎解颐，得无类此。”意思是，此书以“本色说经”，可以补经部之阙，从而为它争取一席之地。今人评价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，自然不会盲目地步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后尘，但对劳氏的理解也有隔阂。劳氏将诗话推到先秦诗学昌盛的源头，填补了此前上古无诗话的空白，并因此而推出春秋诗学的草创之著。此中关捩，就在于他发现《左传》中多有解诗之文，因此而径将《左传》视为诗话之渊薮。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卷二：

解诗者，因诗作解也。左氏传《春秋》，未尝解诗。今日“解诗”，毋乃诬《传》并诬诗欤？曰：不诬也。左氏传《春秋》，故解诗也。未有《春秋》，先有诗。凡征伐宴享，庙谟野俗，一寓于诗，此文、武志也。既无诗，乃有《春秋》，文、武大法寓于《春秋》，此孔子志也。左氏体孔子志作《传》传《春秋》，犹孔子体文、武志，作《春秋》以继诗。然则全《传》皆解诗也，诬云乎哉？

此段文字乃劳书卷二的小序，纲领全卷之文。劳孝舆在这里集中阐明一个道理：左氏为《春秋》作传，未尝解诗，也不以解诗为己任；然而，整部《左传》又都可以看作解诗之文。作者立论的依据，是以《诗》体现了文、武之志；孔子寓文、武大法于《春秋》，此乃孔子之志；而左氏作《传》，又把孔子之志传达出来了。这是经学诠释的路数，固不可取。但是，“全《传》皆解诗也”，这个结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。春秋二百多年间，《诗》的流传以及人们对《诗》的理解和应用，是一幅历史的长卷。对这幅长卷作了真实、全面、编年的描述的，唯有《左传》。在那个时代，用诗、解

① 毛庆蕃：《春秋诗话·前言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9页。

诗不是做学术训诂，而是作为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具体手段，离不开历史语境的现场。所以，作者之论不仅“不诬”，而且颇有见地，揭示了春秋诗学的一个重要特征。作者鉴于毛诗《小序》和朱熹《诗集传》皆难尽信，且与《左传》记载未必相合，故把寻求对《诗》的确切解释的希望寄托于《左传》，并因此而开辟了春秋诗学这一块“处女地”。张汝霖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故乐于鼎力资助此书付梓，他在为此书所作的《序》中说：“春秋时，诗亡而诗学不亡，一时列国名卿，鲁有穆叔，晋有叔向，卫有宁俞。国小如郑，子太叔、公孙侨之流，追随兵车玉帛间，从容扬扅，宗祏赖之。故曰：登高作赋，大夫之才，言其材智深美，可以与图政事也。又曰：歌诗必类，言各有义类当从也。类则不跲于言矣，作则施于有政矣。然则春秋其诗学大昌之会乎！”这段话颇带感情，既是对春秋诗学那一段良辰美景的眷顾流连，也是对劳氏“深于《诗》”、“深于《春秋》”的褒扬。既然“春秋其诗学大昌之会”，那么，中国诗学的这一页是不该忘记的。然而，不该忘记，却又忘记，直到劳氏之书问世，“其庶可以无憾已”。

我们今天应该对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的价值和贡献，作出客观、公正、全面的评价，不必再有投鼠忌器的顾虑。但是，我们在基本认可劳孝舆的几位友人在序、跋中所作的积极评价的同时，也必须明确指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：劳孝舆因取径偏窄、取材单一，致使《春秋诗话》之书名对全书内容统摄乏力、不相值对。毛庆蕃认为该书有可商榷者三，他说：“第一，书名引起误会。春秋指一个时代，《春秋》是一经书。特以一经之传文内容，即《左传》的内容，冠以经书名，而《春秋》经本身并无诗话，自然会想到春秋时代。《春秋左氏传》中的诗话和春秋时代的诗话，其内涵不同。书名《春秋诗话》若不顾内容，最易造成误解。”^①这个批评讲得清楚明白，不难理解。不过，我们对这个问题还可以透过表象，作进一步的分析：一、春秋时代的诗话，除了《左传》之外，还应包括《国语》、《逸周书》等古籍中的诗话。屏蔽了《国语》、《逸周书》等，单一地取材于《左传》，严格地说，劳氏之书只能命名为“《春秋左氏传》中的诗话”，而不能名之曰《春秋诗话》。二、若径以“《春秋左氏传》中的诗话”命名其书，可谓名副其实；然而非但书名冗长、文不雅驯，而且与劳孝舆本人的意图不相符合。上文已引劳氏所述：“既无诗，乃有《春秋》，文、

^① 毛庆蕃：《春秋诗话·前言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0页。

武大法寓于《春秋》，此孔子志也。左氏体孔子志作《传》传《春秋》，犹孔子体文、武志，作《春秋》以继诗。然则全《传》皆解诗也。”这就清楚地表明了劳氏的思路：孔子取《诗》的褒善贬恶之义作了《春秋》，也就是文、武大法皆寓于《春秋》；而左丘明是孔子的代言人，所以在《左传》中能够读到孔子解诗之真谛。可见，劳孝舆是将自己的诗学理论依托于孔子《春秋》，而不是立足于春秋时代。再说，劳氏执拗地绾合《诗》与《春秋》，宁可违背逻辑常理，从中不难看出经学家“以经解经”的惯性思维。劳孝舆的老师惠士奇著有《春秋说》一书，所以苏珥在《序》中说：“孝舆此书，无乃渊源独得”，也可作为旁证。三、把寻求对《诗》的确切解释的希望寄托于《左传》，这种态度和做法，是有风险的。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各卷中一些明显刺谬的说法，似皆渊源于此。

话说回来，开创性的工作，是最艰难的工作，也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工作。在筚路蓝缕的开创中，必然会碰到大量的、十分棘手的事情，必然会遇到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复杂问题和矛盾，很难处置周全。故曰：前修未密，后出传精。提出《春秋诗话》的书名及其相关问题，不无春秋责备贤者之意。必须肯定，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是研究春秋诗学的草创之著。

三

《春秋诗话》的作者劳孝舆，字阮斋，又字孝于，号巨峰，广东南海人，本传见于《清史稿》卷四八五《文苑二》。《清史稿》中的《劳孝舆传》，形式上是列传中的附传，附于《何梦瑶传》之后，实际上是与何梦瑶、罗天尺、苏珥等人的一篇合传，因为他们同属于“惠门八子”。劳孝舆本传曰：

孝舆，字阮斋。乾隆元年，召试宏博，未用。以拔贡生廷试第五，出为黔中令。治古州屯务，足茧万山中。将去，民攀辕曰：“公劳苦以衣食我！”皆泣下。历锦屏、龙泉、镇远诸邑，皆有绩。卒于官。

此传文字过于简略，仅寥寥数语而已。在阮元主持纂修、成书于道光二年（1822）的《广东通志》中，《劳孝舆传》文字略详于《清史稿》，且所据

史实皆用双行小字注明出处。为规范起见，将原文夹注一律改用括号。全文如下：

劳孝與，字阮斋，南海人。拔贡生（杭世骏《词科掌录》）。少好游，渡琼海，登罗浮绝顶，历览江湖衡岳诸胜。受知学使惠士奇（《菊芳园文钞》、《劳氏家乘》），与何梦瑶、罗天尺、苏珥齐名，世称“惠门四君子”（《鱼山文集》），名大噪。雍正庚戌诏修《一统志》，孝與与纂粤乘，发凡起例，多出其手（《菊芳园文钞》、《粤台征雅录》）。乾隆丙辰举博学鸿词（《词科掌录》），台试未用，旋出为黔宰。时苗乱初靖（《菊芳园文钞》、《粤台征雅录》），有屯田之役。始经理三堡，遂入山苗，由二岭至山婆，逾主翁、斗巴，直达琴台，措置八堡屯田，足茁万山者七月。将去，屯之民蚁行盘路而下，攀辕曰：“公衣食我，忍未及睹我饱温而去也！”（《阮斋文钞》）历任锦屏、清镇、龙泉、清溪、毕节诸邑，不名一钱。迁镇远，卒于官（《菊芳园文钞》）。著有《阮斋文钞》四卷、《诗钞》六卷、《春秋诗话》、《读杜识余》（《粤泰征雅录》）。子潼自有传。

这篇传是迄今可见到的劳孝與最详的传记。1928年中华书局印行《清史列传》，后经王钟翰点校，中华书局于1987年又出了《清史列传》新版，其中收录的劳孝與传，与阮元《通志》之传记事大同小异，徒增文字敷衍。又据伍崇曜在给劳孝與《春秋诗话》一书所写的《跋》中说：“《春秋诗话》五卷，国朝南海劳孝與阮斋撰。按先生事迹，具见阮《通志》本传暨吴雁山孝廉文集《七先生传》中。”可惜的是，《吴雁山文集》已失传，收入其中的劳孝與等七人的传略，今人无由谋面。

研究前人的作品，尤其是其中之价值深厚者，通常的做法是首先考证作者的生平、思想，以此作为研究的开端和基础，并将其列为研究著作的第一章，这已是时下论著的“标准配置”。然而，研究劳孝與，则面临诸多困难。劳孝與本传简略，未标明生卒年，其他材料多为畸零片段，散见于简册之中。我们只能根据阮元《通志》中收录的本传及其所征引的、于今尚存的材料，大致勾勒其行状概略，以期尽可能地“知人论世”，为解读《春秋诗话》提供帮助。关于劳孝與的生平事迹，大致可知的是：

一、劳孝與世居广东佛山，出身于仕宦之家。其祖劳翀、其父劳仁，

皆岁贡生，并出任官职。劳仁事其继母（劳孝舆的继祖母）甚孝，以此闻名。劳氏家族的家学渊源、庭训族规，孝舆自幼耳濡目染，受到儒者风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，为尔后的为人为学树立了基本的准则。劳孝舆早年就喜好远足游历，年甫弱冠，即策杖逾岭渡河，跨越琼海，登上罗浮山的绝顶，历览江河衡岳之诸胜景。青年时代的游历，使他领略了各地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，丰富了阅历，同时也使他拓宽了视野、开阔了胸怀、陶冶了情操。这一切，为他后来的诗、文创作，尤其是为他的春秋诗学研究“能于旧巢故垒中力开生面”，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劳孝舆平生交游，圈子不算大，但极有特色。在我看来，有点类似于“孔门师徒”中的仲尼、颜渊、子贡、子夏、子路之间的师承、问学与交往。师长辈当推惠士奇（1671—1741），虽然因丁忧之故，孝舆亲炙惠公的时间不长，但所受影响甚大。“惠门四君子”、“惠门八子”，均含孝舆，可见孝舆是惠氏门下的核心人物之一。惠士奇是清代著名学者，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进士，官至侍读学士。惠士奇治经承其父惠周惕之学，说宗汉学，考证加密。于诸经皆有论著，撰有《易说》六卷、《礼说》十卷、《春秋说》十五卷。惠士奇还有一个显赫的身份，他是乾嘉学派中吴派领袖人物惠栋（定宇）的父亲。惠周惕、惠士奇、惠定宇，东吴惠氏三世传经，与戴震（东原）为首的皖派并称“双子星座”，辉耀着清代学术的天空。惠士奇于1721年至1726年间，出任广东学政，主持广东的科举考试，当然就是那时广东的莘莘学子的老师。惠士奇在提督粤学的六年里，奖掖后学，常以岭南诗文名家勸励门下弟子，希望他们踵事增华，教育和培养了包括劳孝舆在内的一批青年学人。苏珥也是惠氏门下的一员，他在给劳氏之书写的《序》中说：“诸子皆学使惠公所赏识，同在师门，风义倍敦也。”惠公著有《春秋说》，所以苏珥谓“孝舆此书，无乃渊源独得”，又谓“孰知河汾之传，犹有瓣香未坠耶”，认为劳孝舆著《春秋诗话》是师承了惠公的学说，薪尽火传。惠门弟子之间，相交莫逆，风义倍敦，遇事很仗义。劳孝舆个性较强，恃才傲物，与修纂省《志》的同事时有齟齬。阮元《通志》中的《罗天尺传》云：“孝舆忤俗，被口语，天尺力白之。”可见师门弟兄是力挺他的。

三、劳孝舆一生履历，虽难以确考，而轮廓大致清晰可见。策杖远游，渡琼海，登罗浮，历览江河衡岳之胜，大约二十岁光景。赴省城应试，受知于惠士奇，名列“惠门四君子”，寻告丁忧，大约二十八岁左右。

参与修纂《粤乘》，虽发凡起例，多出其手，然遭谤议，拂袖而去，大约三十四岁左右。经鲁太史荐至饶平县幕府，旅食无聊，托笔墨自遣，撰成《春秋诗话》五卷，大约是在三十五岁至三十七岁之间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举博学鸿词，台试未用，旋出为黔宰。四十岁以后的十年里，历任贵州的锦屏、清镇、龙泉、清溪、毕节诸县的地方官。能体察民情，系心民瘼，故有政声，有遗爱，大约五十岁卒于任所。毛庆耆的考证结论是：“孝與生卒年的写法，应是1697—1746。”^①与蒋寅的结论相比对，生年、卒年各有一年之差。

四

蒋寅踵武郭绍虞《宋诗话考》，以十年的时间广为访求，悉心辨证，乃著《清诗话考》。蒋寅《清诗话考》分为上、下编。上编为《清诗话目录》，下编为《清诗话经眼录》。在下编的《雍正、乾隆卷》中，对劳孝與《春秋诗话》作了考证。全文如下：

《春秋诗话》五卷，劳孝與撰，乾隆十六年（1751）张汝霖刊本。前有是年至日苏珥序、是年重阳日何梦瑶序、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六月盛逢澜（按：应为盛逢润）序，后有罗天尺后序，男济、潼《先明府诗钞纪后》。劳孝與（1698—1747），孝子，号阮斋，又号巨峰。广东南海人。师从惠士奇。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拔贡。乾隆元年（1736）举博学鸿词科不第，以拔贡廷试第五人，官贵州龙泉、镇远知县，卒于官。有《阮斋诗文集》、《读杜窃余》等。事迹见劳济、劳潼《先明府诗钞纪后》。据罗天尺后序，雍正八年（1730）劳氏与辑粤志，负奇忤物，虽拂衣去，鲁煜荐于饶平县幕，旅食无聊，托笔墨自遣，遂积成此书。盛序云雍正十一年与劳孝與同在端州官署校阅试卷，事竣，孝與出诗话属序。然则诗话作于雍正八年间也。此书辑《左传》中所载春秋时诗事，按内容及功能分作“赋诗”、“引诗”、“解诗”、“拾诗”、“评诗”五卷。各卷冠以小序，叙其义旨，卷末又综而论之。中间各则列举原文，系以疏释，而皆以阐释诗心诗意为指归。卷四辑录《左传》中韵语，别为十一类，尤足证古诗源流，亦颇

^① 毛庆耆：《春秋诗话·前言》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6页。

见诗史眼光也。盖其说诗能脱出经学藩篱，抉发诗学意蕴，故不迂不固，明爽可喜也。叙“赋诗”云：“当时只有诗，无诗人，故人所作（引者按：应为“古人所作”），今人可援为己诗；彼人之诗，此人可赓为自作，期于言志而止。人无定诗，诗无定指，以故可名不名，不作而作也。”要言不烦，而见识自透脱。其说解各章，亦多言简意切，贯通诗理。卷二赞《左传》“将诗句一点，大旨要然，不烦言而解，作解诗观，悠然有味”，可移以自赠。《四库提要》为此书体例“既不同诠释传文，又非尽沿讨诗义，编葺虽勤，殊无所取也”，似评之过苛。惟采集尚有遗漏，如僖公九年、二十一年、文公十年有引诗例，昭公二十三年有解诗例，僖公四年有拾诗例，已为今人毛庆耆指出。有时借题发挥，或偏离本旨，如说齐高厚赋诗不类之“类”字是也。有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刊本、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刊粤雅堂丛书本、文字欢娱室刊岭南遗书本、丛书集成初编本、台湾广文书局翻印岭南遗书本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版岭南丛书毛庆耆点校本据光绪本排印。^①

之所以将这段文字原文照录，是因为《春秋诗话》现存各种版本，皆由作者“经眼”，所言定当有据，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个概况。蒋寅认为“其说诗能脱出经学藩篱，抉发诗学意蕴，故不迂不固，明爽可喜也”，大体上符合实际。当然，蒋寅做的是《清诗话》通考，不可能为劳氏一书安排过多的篇幅。

劳孝舆在困顿中写出的《春秋诗话》，不能遭际风云，命途亦复坎坷，沉寂二百余年。直到现在，才开始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广泛的关注。当今学术昌明，兼容并包，与《四库》馆臣严词苛责之际，自是判若霄壤。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，为之洗发机缘，还其本真，确认其应有的历史地位。不仅如此，还应该充分开发和利用其中蕴含的诗学思想的资源，以丰富中国古代诗学和文学研究，服务于今天的大规模的文化建设。

中国古代之诗学，所从来久远矣！从西周到春秋，诗歌创作繁荣，诗学亦由此发轫。然而，诗学之思想和资料散见于史乘之中，先秦时期，

^① 蒋寅：《清诗话考》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，第337—338页。

并无专门的诗学研究的著作。汉代以后,《诗经》坠入经学之窠臼与“厄运”^①,固毋庸论。劳孝舆独具慧眼,开辟了春秋诗学研究的新生面,他的《春秋诗话》,是研究春秋诗学的草创之著。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的历史功绩不容抹杀和忽视,而支撑其历史地位的,主要是劳氏之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真知灼见和理论建树。

首先,提出“弦诵有素,诗作典用”之说,为春秋诗学基本面貌的描绘确立了总基调。春秋时期,这边厢是战火狼烟,那边厢是诗乐酬酢,一时间,诗学名家辈出。鲁国有季文子、穆叔,晋国有叔向、赵武、韩起,郑国有子产,齐国有晏婴,卫国有北宫文子,这些政坛风云人物追随兵车玉帛间,从容扬扆,一言兴邦,宗祏赖之,留下空前绝后的一代奇观,也就是春秋诗学的文化奇观。鸟瞰和描绘春秋诗学的基本面貌,既须宏观视野,尤须学者腕力。劳孝舆《春秋诗话》卷三:“若夫《诗》,则横口之所出,触目之所见,沛然决江河而出之者,皆其肺腑中物,梦寐间所呻吟也。岂非《诗》之为教,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厌饫之者,至深远而无涯哉!”春秋三百年,列国公卿大夫赋诗以言一己之志、一国之志,风流潇洒地从事于外交谈判与斡旋,列国公卿乃至《左传》叙事人以“君子”的名义引诗以证事、论理或作史评,《三百篇》中的诗句之所以横口而出,得手应心,就因为那个时候诗、乐还没有分家。墨子所说的“诵《诗》三百,弦《诗》三百,歌《诗》三百,舞《诗》三百”^②,尚流行于当时。顾颉刚说:“这三百多篇诗是春秋时人唱得烂熟的,也是听得烂熟的。……大家对于这些入乐的诗都是唱在口头,听在耳里,记得熟了,所以有随便使用它的能力。”他又说:“所以虽是乱用,却没有伤损《诗经》的真相。”^③正因为唱在口头,听在耳里,唱得烂熟,听得烂熟,所以,虽是即席发挥、随意应用,却并没有“损伤《诗经》的真相”。这就是春秋诗学独特的,也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、后不见来者的传达机制。若没有这个传达机制,则大量的“打哑谜”一般的赋诗只成闹剧,岂可在严肃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彼此沟通、心领神会?劳孝舆用“弦诵有素,诗作典用”八

① 顾颉刚《〈诗经〉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》,发表于《小说月报》十四卷时,原题为《〈诗经〉的厄运与幸运》,顾文载于《古史辨》下编第三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② 《墨子·公孟》。

③ 顾颉刚:《〈诗经〉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》,《古史辨》第三册下编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344—345页。